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9.05.0007

话语间性视域下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

李万平,方爱东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话语间性的存在使这种建构面临多种困境:话语阶层多样性,主流话语整合权威弱化;话语符号互异性,主流话语引导权威淡化;话语语境复杂性,主流话语感召权威减化。因此,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通过创建话语主体间性模式,提升主流话语整合权威;规制话语符号叙事范式,加强主流话语引导权威;做好话语语境动态适应,巩固主流话语感召权威。

关键词:话语间性;主流话语权威;建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5-0046-07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主流话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依托,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载体。主流话语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反映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念和思维的言说及表达方式。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这种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具重要意义。但是,话语间性的存在却使主流话语存在于一种张力状态之下,而这种话语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主流话语的权威属性和影响着主流话语的功能实现。因此,正视话语间性视域下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困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积极引导社会民众尊崇主流价值和认同主流话语,这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内涵及建构意义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274}恩格斯将权威的内涵概括为强制性和服从性的有机统一,它既表现为以强制力为依托的“硬性”权威,旨在实现某种意志的施

加,人们对它是一种被迫服从;也表现为以感召力为基础的“软性”权威,即以某种理论学说的明智性、道德人格的崇高性、行为实践的示范性来赢得人们的自愿服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可使处于权威影响力以及范围内的成员(包括主客两方)形成共同的意志,使这一范围内的人们接受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提供为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2]同时,“权威在现代社会的运行结构中日益取代权力的强制性机制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机环节”^[3]。基于此,本文将主流话语权威的内涵界定为:它不是依靠外力强制形成的“硬性”权威,而是基于主流话语得到理解和认同而使人自觉内化与自愿服从的“软性”权威。在这里,主流话语的软性权威亦可称之为情感性权威,它是建立在人们对主流话语感情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另外,任何一种社会或社会组织其本身的有序运行,都需要一定的机构、人员去进行协调、组织和引导,否则就难以形成统一的群体意志,也难以展开统一的群体行动,最终将会导致观念多元、秩序混乱。也就是说:“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1]276}只要社会存在,权威就一定会存在,而不管权威形式如何。

收稿日期:2019-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KS084)

作者简介:李万平(1992—),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方爱东(1963—),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

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4]“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意味着不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凝聚广泛的思想共识,还要熔铸磅礴的奋进力量,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依赖于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我国主流话语从传播、理解到接受不仅是一个承载信息传播交流的过程,同时还承担着意志整合、价值引导和精神感召的功能。因此,主流话语权威的实质内含主流话语的整合权威、主流话语的引导权威以及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首先,主流话语的整合权威。主流话语整合权威即是指主流话语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有能力整合多种话语思想、话语力量和话语行为,并为其提供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另外,主流话语还能够统摄、控制不符合“主导”意识形态要求和标准的非主流话语,使其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相协调。其次,主流话语的引导权威。主流话语的引导权威即是指主流话语能够自觉引导多种话语的良性博弈,彰显主流话语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使其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为广大社会民众提供价值引导。最后,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即是指主流话语凭借其自身所负载的意志整合力和价值引导力能够进一步增强其精神感召力,并号召广大社会民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实现主流话语立言达道的话语目标。当前,为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建构我国主流话语权威。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需要在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中凸显主流话语的意志整合力,提升主流话语的整合权威;在互弈性的话语符号中加强主流话语的价值引导力,强化主流话语的引导权威。同时,在主流话语具备意志整合力和价值引导力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加强主流话语的精神感召力,巩固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

二、话语间性视域下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困境

“话语间性是指话语在实现其功能过程中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即话语存在于一种张力状态下。”^[5]当前社会,由于话语阶层的多样、话语符号的互弈、话语语境的复杂等多种间性因素的影

响,主流话语的整合权威、引导权威以及感召权威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建构困境。

(一)话语阶层多样性,使得主流话语整合权威弱化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日趋加剧,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变化,社会阶层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多样性的社会阶层象征着多样性的话语表达。因此,社会阶层的多样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代表着话语阶层的多样性。话语阶层的多样性,即话语各阶层都可通过一定的话语来确证自身的存在,来表达自身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来议论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走向。但是,由于不同的话语阶层存在着话语立场的差别、话语权力的分化、话语资源的失衡,使得话语的意志属性(甚至是意识形态属性)必然存在,即话语并不是语言和文本的简单构成,而同时也展示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信仰结构。马克思曾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这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重组日趋加剧以及民众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民众的话语身份会随着话语地位和利益关系的动态演变而随之改变。自然,话语身份的改变也必然会催生出代表不同话语阶层利益诉求的种种话语意志体系,甚至导致不同话语阶层话语权力势态的失衡,并直接诱发民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变,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概括而言,话语阶层的多样化,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模式,改写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力格局,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话语阶层间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对立与冲突,进一步加剧主流话语的分化和离散风险,严重冲击着主流话语体系的表达范式,无形之中加大了构筑相对稳固的话语认同的难度,使得主流话语领域的少数地方存在着“失语”和“无力”的尴尬现象,因而也就导致部分社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偏离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主流话语整合权威的建构在某些领域面临着严峻挑战。

(二)话语符号互弈性,造成主流话语引导权威淡化

“符号是人们在认识与交往中建构的话语表达方式,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符号并享用符号。”^[7]现实生活中,话语信息的传播、话语意义的表达、话语思

想的建构,都需要通过与之相关的符号体系的有机结合才能够实现。主流话语也正是通过特定的话语符号来展现其内蕴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主张。由此看来,各种话语对民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通过话语符号这一载体来实现的,民众经常可以从不同的话语符号中来解读意识形态的走向。因此,在话语系统中,符号既是传递话语内容的一种话语形式,又是表征话语意志的一种话语载体。一方面,作为传递话语内容的一种话语形式,话语符号种类繁多。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具有相互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又衍生出了话语符号选择等方面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人们在面对多种多样的话语符号时,往往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思想观念找到自己“所属领域”的话语符号。同时,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各类带有商业性的话语符号不断挤压具有主导性的话语符号的生存空间。如:感性的生活话语、泛化的大众话语、碎微的网络话语及戏谑的狂欢话语等这类带有一定的娱乐化、功利化和务实化的话语符号,更易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社会民众的青睐。可以说,它们的存在、发展冲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符号。另一方面,作为表征话语意志的一种话语载体,话语符号属性多元。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多种话语符号相互争夺话语代言者和话语空间,抢占民众话语阵地,特别是西方话语符号的隐性渗透,严重冲击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话语符号体系,并使得部分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在多元话语符号的相互博弈中发生动摇,造成他们价值观和信仰追求危机。同时,不少社会民众可能会由于缺失核心价值观的引导,陷入了价值观迷茫,进而加大了话语符号满场与价值意义空场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话语符号间的相互对抗关系,造成主流话语引导权威的淡化。

(三)话语语境复杂性,导致主流话语感召权威减化

话语是社会性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的语境,并且话语得到理解和认可的程度也受制于话语传播的话语语境。作为话语的一种客观属性,语境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同话语生产、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密切相关的多种话语因素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话语语境是话语情感得以生成、话语意义得以理解、话语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当前,由于我国现实语境与网络语境的复杂化,导致主流话语在其传播过程中,容易忽视话语语境与话语内容

的耦合适应关系,减化了主流话语的说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一方面,现实语境的复杂。当前我国的社会现状不容乐观,“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国民权利保障、社会生活保障、城乡对立、贫富差距悬殊、贪腐制度根源等,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8]。在这种社会现实与主流话语的价值追求相背离的话语语境下,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很难获得同步协调的话语表达,严重影响了主流话语在社会民众心中的权威地位,甚至引发部分社会民众对主流话语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产生质疑,消解了主流话语认同的价值基础和群众基础,严重影响着主流话语感召权威的建构。另一方面,网络语境的复杂。网络新媒体时代,话语参与主体平等泛在、话语空间环境开放自由、话语表达渠道便捷多样,每个人都可以依托媒体平台上传、分享各类话语信息。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发展趋势及传统话语参照系的残缺,人们的行为已不再局限于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演变成对媒体通过话语符号所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9]。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充斥的各类话语信息都是对客观现实社会的“拟态投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积极倡导的内容“不切合”现象,并且这类“不切合”现象往往会被某些不知名者以极其隐匿的方式上传、分享至网络空间,迅速实现爆发式传播,对社会舆论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使不少社会民众逐渐失去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进而对党和政府主动构建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产生质疑,大大减化了主流话语的精神感召力。

三、话语间性视域下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路径

我国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应当着力减少主流话语传播过程中的话语间性。为此,可通过创建话语“主体间性”模式,追求渐趋平衡的话语阶层间的良性互动;规制话语符号叙事范式,彰显主流话语符号的价值载体和意义载体功能;做好话语语境的动态适应,实现话语语境与话语内容的耦合转换。

(一)创建话语主体间性模式,提升主流话语整合权威

主体间性必然包含主体间的双向互动。提升主流话语整合权威就是在话语阶层之间的对话、沟通和理解等交往互动方式的基础上,促进话语权力均衡、话语意义共享和话语传播实效。

首先,搭建话语参与平台,均衡话语权力格局。宣传思想工作应联合相关政府部门搭建话语参与平台,并有效释放各个话语阶层的话语诉求,以将他

们的话语意志和话语要求纳入到话语采集系统。其一,扩大政治话语参与。扩大人们的政治话语参与,不仅要不断提高话语参与者的思想文化素质与政治参与能力,还要根据现实需要和制度规定调整不同话语阶层人士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人数比例,使身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拥有不同兴趣、不同特长,偏好不同生活方式或文化形式的大众,都可以从中获取平等的话语权力,体现政治话语参与的广泛化、多层化和制度化特点,有效均衡话语权力格局。其二,落实生活话语转换。国家应号召各地创建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台,并依托这一平台将“术语固定、语境严肃、情味淡薄”的主流话语内容转换成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有效提升主流话语的“讨喜度”,使之更好地为广大社会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只有实现了社会民众思想认知的“同频共振”,才能激发其实践行为的“和谐一致”。其三,创新学术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阶层,有着各自的话语诉求。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带领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启动话语吸纳机制,倾听、包容、尊重不同话语阶层人士的话语诉求,并将其话语的合理化因素融渗到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进一步创新学术话语体系,使其不仅适应现实社会生活,而且还要贴近老百姓的日常表达,真正“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10]。

其次,营造话语互动氛围,促进话语意义共享。主流话语能否被广大社会民众“听得懂、听得进、讲得出”,这就需要依托不同话语主体间的良性互动。话语各主体间的话语互动是主流话语运行的基本机制,也是进一步整合多种话语内容的有效途径。因此,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建立起主体间性模式,积极营造话语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形成极具动态性和对话性的话语系统。一方面,通过话语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能够极大地扩展话语对话空间,使不同的话语阶层人士感悟到彼此的精神相通和休戚与共,并能够超越话语个体的有限话语视界(话语视界指对话语意义的一种预期表达),而使话语双方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话语视界,并顺畅地达成话语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如:通过话语各主体间的积极互动来诠释“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指出它是个体梦与群体梦的辩证统一,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追梦、圆梦”不仅是国家的追求,更是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另一方面,不同话语阶层人士在话语互动中能够就某一话语内容提出质疑并展开话语讨论,通过话语参与者的相互交

流、平等讨论、交互影响能够使话语各主体间的理解水平得到提高、良好的话语互动氛围得以形成、话语各主体间信任程度得以加深。话语认同归于话语理解、话语共享和话语信任。因此,通过营造话语互动的良好氛围,能够使话语各阶层在相互平等的交流、对话中,促进话语意义的共享,进而在话语意义共享的基础上整合话语阶层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并实现二者话语意志的渗透、理解和同构,最终达成话语共识。

最后,做好话语反馈工作,提升话语传播实效。话语反馈是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话语受众与话语内容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与互动,相关部门要积极组织 and 创造充分的反馈条件,主动做好话语反馈工作。一方面,注意话语受众的利益诉求。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因此,党和国家在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分化的背景下传播宣介主流话语时,要做好不同话语阶层的利益反馈工作。“利益反馈是通过利益表达方式来体现,利益表达是社会成员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并使要求得以满足的政治行为。”^[12]相关工作者可事先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了解不同话语阶层的需要,使话语主体表达的观点一定要和不同话语阶层的具体利益相结合。主流话语只有符合了广大社会民众的目的和利益,才可能得到不同话语阶层的认同,没有他们的认同,主流话语也就难以发挥其支配和整合作用。另一方面,关注话语受众的情感回应。主流话语要想为不同话语阶层提供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获得他们的自觉内化和自愿服从,这就要求话语主体不仅应关注如何“发声”、为谁“发声”,还应关注话语受众在接受主流话语“发声”后所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做好话语受众的情感反馈工作。只有这样,宣传思想工作者才能够根据话语受众的反馈意见及时了解民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积极调整和优化主流话语的传播方案,并利用民众喜爱的话语方式和运营机制,来建立主流话语和民众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提升主流话语传播实效。

(二) 规制话语符号叙事范式,强化主流话语引导权威

主流话语引导权威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实现主流话语符号的价值载体和意义载体功能,引导或影响话语受众的行动和行为。但是,多元话语符号的互弈格局,扰乱了这一功能的实现。因此,需要规制多元话语符号叙事范式,实现话语的言之有“理”、言之有“利”、言之有“力”,能够形成正确

的、合理的、规范的话语表达范式,强化主流话语引导权威。

首先,界定主导性的话语范围,掌握话语“权”。在话语符号互弈中,话语权指话语主体依托话语符号实现话语引导的能力。多元话语符号的互弈,不仅会危及我国主流话语符号的话语力量,还会使不少社会民众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情感困局和价值困局中。因此,这就需要一个既具备情感主导性又具备内容主导性的话语符号来还原话语价值、引领话语方向。一方面,注重话语符号情感的主导性。话语受众能否接受、理解和认同话语主体所传递的话语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符号是否能够为话语受众所接受,即话语符号是否具备可理解性、可沟通性。因此,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在展开话语互动时,要使用话语双方互为熟知、相互接受的话语符号来有效地组织话语,确保话语逻辑清晰、话语结构合理以及话语方式亲民。另一方面,把控话语符号内容的主导性。面对多元话语符号的博弈和竞争,话语主体要站稳话语立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的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一切,还要有选择地吸收、有借鉴地容纳他种话语符号的价值理念,甚至在保持主流价值观、主旋律道德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适时更新主流话语的符号系统,对不同的话语符号进行契合主流价值的解释和引导,使主流话语符号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社会民众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其次,强调人民性的话语内涵,凸显话语“势”。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3]所以,无论我国的主流话语内容如何转型、话语表达方式如何变换,都离不开人民这一价值主体。牢牢掌握人民这一价值主体,能够凸显我国主流话语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主流话语的生产主体、传播主体和实践主体,自然也要在话语生产、话语传播和话语实践中,确立人民性的鲜明立场和价值取向。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得主流话语符号在多元话语符号市场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可和青睐。一旦主流话语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可和青睐,就意味着它在道义上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其话语的价值引导力便能够得到实现。因为“对于某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承载自身价值理念的话语符号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是意识形态赢得民众‘召唤’的基础和前提条件”^[14]。因此,主流话语引导

权威的建构,要求话语主体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切实走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以便话语主体能通过“心理移情、情感换位”的方法,确立主流话语与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并有效拉近话语主体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为有效发挥主流话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引导筑牢民心根基。

最后,坚守实践性的话语特色,增强话语“力”。“话语力”是指“通过话语实践所实现的话语资源的转换力,即引发言说对象的注意程度、理解程度和认同程度,认同是其核心”^[15]。任何话语都是一种实践话语,话语离开了实践性,也就成为了没有任何意义体现、没有任何价值彰显的“空话”。毛泽东曾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7]同样,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显著特征。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主流话语引导力的提升,不是通过解决“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来实现,而是要通过解决“做什么”的社会实践问题来实现。一言以蔽之,主流话语只有面向生活,立足实践,从理论性、政治性、抽象性转换为时代性、通俗性、实践性,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所倡导的美好生活目标转变为人民群众能真切感受到的切实利益,才能够真正检验主流话语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才能够真正彰显主流话语的话语意蕴、话语价值以及话语力量,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和深化,进而引发人民群众对主流话语的注意程度、理解程度和认同程度,有效增强主流话语的引导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三)做好话语语境动态适应,巩固主流话语感召权威

话语间性视域下主流话语权威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主流话语整合权威的提升、主流话语引导权威的强化,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恰适的话语语境有利于排除、减弱与话语传播无关或起反作用的环境刺激,不适的话语语境则影响了话语传播过程中其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有效发挥。因此,巩固主流话语感召权威,需要做好话语语境动态适应。

首先,找准话语关联点,激发情感认同。话语关联点即为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基于特定的话语情境而形成的相互关联性。在现实的主流话语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宣传思想工作者有必要充分考虑民

众所拥有的思维模式、价值旨趣等背景性的语境因素,加工提炼民众乐于传说的话语素材,实时切换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探寻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所持价值观的契合点,激发民众的情感认同。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采取“选择性注意”的传播模式。话语主体要找准民众话语和主流话语的最佳关联点,强化二者之间的契合度,尽可能最大化地使主流话语与民众现有的生活方式相融合以及与民众渴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相适应,这样才能提升主流话语内容的吸引力,促使话语受众在对主流话语的解码过程中,实现对主流话语内容的选择性注意。另一方面,运用话语论证的传播策略。话语论证是话语主体在遵守论证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话语修辞使主流话语更加符合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的一种手段。透彻的理论才具有说服力,有说服力的话语才更具有感召力。因此,为实现主流话语理想化的感召效果,话语主体可组织专家学者展开对主流话语意义、主流话语价值的多维论证,既要追溯主流话语内容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又要论证它们契合了现代文化语境下关于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的新期望,还要论证在不同话语诉求的基础上主流话语是可以被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所认可的社会共享价值,从而能够增强主流话语的合理性、有效性和透彻性,最终达到劝服民众、感召人心的目的。

其次,打造话语共同体,增强理论认同。所谓话语共同体,是指以话语理解为基础、以话语情感为依托、以话语实践为导向而形成的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之间关联性强、紧密度高的有机话语整体。话语双方一旦形成“共同体”,就意味着话语系统中的各方在话语情感上具有依赖性,在话语实践上具有规则性,在话语认同上具有趋同性,这为凝聚话语共识打下了良好基础。习近平曾指出:“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18]因此,打造话语共同体不仅包括打造现实话语共同体,同时还包括网络话语共同体。一方面,打造现实话语共同体。现实话语共同体即植根于民众的现实生活,打造一个感情关系融洽、目标利益契合的“共同体”,促使共同体内的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结构,共同推动全社会的思想共识、情感共鸣、行动共进,有效增强人们对主流话语的理论认同。另一方面,打造网络话语共同体。网络话语共同体即立足于民众的网络生活,为每一个话语参与者提供平等的话语表达机会,同时也为他们的网络行为划定界限,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网络话语共同体能够增强网民凝聚力和网民行动力,有效强化网民对主流话语的忠诚信仰,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也能执着地坚守、自觉地践行主流话语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以及策略目标,积极维系规范的网络话语秩序,合力营造良好的网络话语生态,进而让网络话语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最后,共绘话语新愿景,强化行为认同。话语愿景是具有引导、激励和感召话语受众的有关话语理论本身和话语目标达成的话语展望,共绘话语愿景由话语主体与话语受众共同完成。一方面,共绘话语理论愿景。基于当前复杂的话语语境,共绘话语理论愿景就是要提升主流话语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适应力,让广大社会民众能够充分了解和感受主流话语的意蕴价值、深刻意义及理论前景,为他们提供方向性的长程导向,引导教育他们正确面对社会现象,理性看待社会现实,科学分析发生原因,合理调试对复杂社会的适应心态,从而使他们在面对话语冲突或遭受其他话语攻击的过程中依然坚持选择尊崇主流价值和认同主流话语,并按照核心价值观念的要求立言践行。另一方面,共绘话语目标愿景。疏离生活的话语是空洞的、无意义的,任何理论性话语都要面向生活实践,体现其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重要意义。因此,话语主体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并向社会成员呈现其生活化目标,解释其本质性特征,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如:通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这一客观现实,向社会成员讲述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人民才不断走向幸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从而能够有效提升主流话语的形象感召力,巩固主流话语的感召权威。简言之,通过共绘话语理论愿景和话语目标愿景,能够创设一种理想的话语语境,并号召广大社会民众共同致力于实现主流话语立言达道的话语目标。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论权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薛广洲.权威特征和功能的哲学论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23-30.
- [3] 薛广洲.权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
- [4]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8-22)[2019-05-24].<http://www.>

- 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 [5] 董爱智,宋德文. 话语间性及其话语“治疗”[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63-68.
-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7] 龙柏林,梁桂云. 符号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视点[J]. 广西社会科学,2018(4):20-25.
- [8] 陈汝东. 论中国国家话语的发展趋势[J]. 学术界,2017(2):19-29.
- [9] 杨晓光. 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3):38-42.
- [10] 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习近平对社科界的十句谆谆教导[EB/OL]. (2019-03-04) [2019-05-24].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4/c40531-30957131.html>.
- [11] 马克思,恩格斯.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 [12] 张素梅. 阶层分化与中国梦的实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5.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52.
- [14] 陈国栋,袁三标. 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格局的影响[J]. 理论月刊,2016(3):138-143.
- [15] 冯春梅. 全媒体语境下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双重转向[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73-78.
- [16] 毛泽东.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M]//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 [1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5-04) [2019-05-2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 [18] 习近平. 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M]//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5.
- [19] 国家统计局. 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EB/OL]. (2018-09-03) [2019-05-24]. 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责任编辑:陈可阔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Authori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inguality

LI Wanping, FANG Aido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authorit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ut the existence of interlinguality makes this construction face many dilemmas: discourse class diversity, mainstream discourse integration authority weakening; discourse symbolicity, mainstream discourse guidance authority fading; discourse contextual complexity, mainstream discourse inspiration authority reduction. Therefor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ers must create discourse intersubjective models to enhance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tegration authority; regulate discourse narrative paradigms to strengthen mainstream discourse guidance authority; do a good job of discourse context dynamic adaptation to consolidat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spiration authority.

Key words: interlinguality; mainstream discourse authority; construction